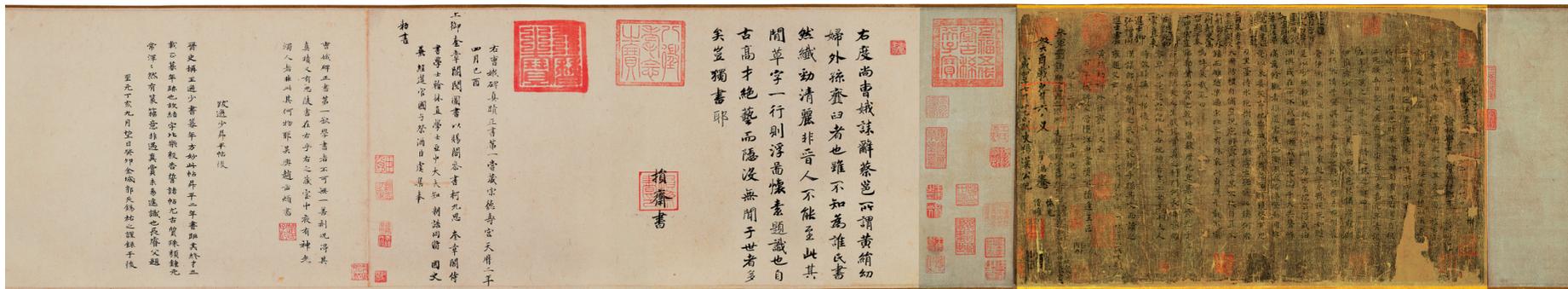


辽博“正体书法展”中展出极其珍贵的东晋书法作品——《曹娥诔辞》让我们看到楷书的源头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探新展 TAN XINZHAN



辽博展出的东晋书法作品《曹娥诔辞》(右半部分),上面留有各时期书法家、收藏家的题跋(左半部分)和印迹。

目前,“合规同矩——辽宁省博物馆藏正体书法精品展”正在展出。此次展览共展出与书法相关的文物11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东晋著名书法作品《曹娥诔辞》入展,引人关注。这件书法作品在中国正体书法演变史上具有标记意义——由隶书转为楷书的重要节点,备受后世书法家推崇。

1 一个人一块碑一段故事

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合规同矩——辽宁省博物馆藏正体书法精品展”以书法文物珍贵、展陈脉络清晰而受到各界欢迎。展览共展出书法、青铜器、漆器等文物11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11件。作为该展览重点推荐的书法作品,国家一级文物、东晋时期的《曹娥诔辞》受到多方关注。

“除了它在中国正体书法演变史上具有标记意义外,围绕这件文物本身的诸多谜团,以及作品上那些保留下来的、流传有序的印迹,也让《曹娥诔辞》充满魅力。”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学术部副研究员张盈袖对记者说。

《曹娥诔辞》的背后,是一个人的故事,一块碑和一段与曹操有关的故事。曹娥,东汉人,著名的孝女,生活在今天的浙江绍兴地区。相传,在东汉年间的某一个端午节,曹娥的父亲在舜江祭祀屈原时不幸溺亡,且多日不见尸体。年仅14岁的曹娥沿江寻找父亲,一连多天仍未找到,她在悲痛之余舍身投江。几天后,两具尸体浮出水面,是曹娥抱着父亲。

曹娥的孝行感动了当地主政者。元嘉元年(151年),上虞县主政者度尚为曹娥立碑,并请人把专为

曹娥撰写的“诔辞”雕刻在石碑上,这就是著名的曹娥碑。张盈袖表示,所谓的“诔辞”,指的是一种志哀文字,主要是用来表彰死者的德行,以四言为句。

那么,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曹娥诔辞》书法作品是不是那块东汉曹娥碑的原文呢?

“目前还无法确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石碑雕刻是在东汉时期的151年,而这件书法作品的写作时间是东晋升平二年,即公元358年,二者相差了200多年,也就是说,石碑比这件书法作品早了200多年,而且石碑无存,无法进行比对。”张盈袖说。

这里又引出了一个疑问:诔辞内容是写给谁的呢?

已故博物馆学专家、书法鉴定专家杨仁恺曾专门对曹娥碑的内容进行过研究。

对曹娥碑文撰写者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近2000年来一直存有不同解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典籍上有不同记录。有人认为,曹娥碑碑文的作者是上虞县的主政者度尚,也有人认为是度尚的弟子邯郸淳,



《曹娥诔辞》局部放大,红框为韩愈题字。

还有人认为是其他人。杨仁恺经过综合分析认为,石碑上的诔辞撰写者是度尚。

史料记载,曹娥碑文除了故事凄美、诔辞著名外,其上还有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的题刻,在《三国演义》中留下一段名传千古的故事。

有一天,曹操和主簿杨修路过,在曹娥碑的石碑上看到了东汉文学家蔡邕题刻——“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询问杨修是否知道这八个字的意思,杨修回答说:“但曹操禁止杨修说出答案,表示自己要想一想。二人走了30里后,曹操对杨修说:‘我破解了其中的意思。’这时,曹操让杨修将答案写下来,并与自己的想法进行比对。结果,二人答案一致,即这八个字的意思是‘绝妙好辞’。曹操慨叹道:‘我的才智不如你,相差了30里路程。’这也是‘智差三十里’一说的由来。”

2 是否王羲之真迹? 有赞也有否

辽博展出的书法《曹娥诔辞》是不是东晋曹娥碑上的原有字体,目前已无法确定,但这并不妨碍研究者对这件作品出自东晋书法家的肯定。因曹娥碑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后人根据书法作品的内容再刻曹娥碑,拓印后即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曹娥碑》字帖。

那么,辽博收藏的这件《曹娥诔辞》的作者又是谁呢?张盈袖说,目前学界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由东晋时期大书法家王羲之所写,持这一观点的是北宋时期的黄长睿;一种认为是东晋时期一位佚名作者所写,持这一观点的是宋高宗赵构;还有一种认为是六朝时期的人所写,持这一观点的是元代陈绎曾。不过,对于这件作品

的书写时间为东晋时期,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一致,这样一来,元代陈绎曾“六朝人所写”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根据文献记载可知,东晋时期的王羲之的确写过《曹娥诔辞》,但是否流传下来,是否就是辽宁省博物馆正在展出的这件,一直存在着争议。

资料记载,北宋晚期大鉴赏家黄长睿曾在《曹娥诔辞》上题跋,他认为这是王羲之的真迹,并且肯定是王羲之晚年作品。不过,黄长睿的题跋原件并没有保留下来。宋末元初,另一位鉴赏家郭天锡把黄长睿的题跋内容写了下来,并留在了辽博收藏的这件《曹娥诔辞》的拖尾处,以佐证这件作品为王羲之的真迹。但因为他的文字记载不够翔实,再加上这件作品流传过程十分复

杂,黄长睿认定的那件“王羲之真迹”是否就是这件作品,目前证据不足。

到了清代,辽博收藏的这件《曹娥诔辞》进入宫内。康熙皇帝视这件作品为珍品,亲笔题跋,让大臣一并欣赏,并在作品上留下观款。康熙写道:“相传为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得意书。”并表示:“楷之精,未有与之匹者。”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是王羲之的作品。

在这件书法作品流传的1000多年里,虽然多人认为这幅《曹娥诔辞》就是王羲之真迹,但南宋高宗赵构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肯定这是东晋人所写,“非晋人不能至此。”仅此一点,就已凸显这件书法作品的重要性了。

3 为何如此珍贵? 晋代书法作品存世只有三件

宋末元初著名书法家赵孟頫在此作上留言:“曹娥碑正书第一”,可见其对这一书法作品的推崇。另外,这件作品上还有唐朝文学家韩愈、书法家怀素的笔迹。杨仁恺认为,这件东晋时期的书法作品,作者不是王羲之。他的这一判断,与中国书法字体的演变紧密相关。因为《曹娥诔辞》的书法字体处于隶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中,是书体变化的见证者也是实践者,这更凸显了辽博所藏这件珍贵文物的价值与意义。

杨仁恺认为,中国的书法发展历史有规律可循:楷书是从隶书演变而来。三国时期的大书法家钟繇所写的楷书可以看出隶书的韵味,而王羲之

的书体从钟繇继承而来。我们从留传下来的王羲之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正处于汉字这一演变的时代。

如果《曹娥诔辞》真的是王羲之所作,那么,作品中的“升平二年”说明王羲之的这幅作品时,是在他去世之前的3年。根据其书法艺术的脉络来看,这时“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已经发展到较为成熟的楷书,而不是介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阶段,所以,据此判断,辽博的这件《曹娥诔辞》可能不是王羲之的真迹。

维系千年的汉字不仅是记载和传承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桥梁与纽带。其中的书法艺术既是中华优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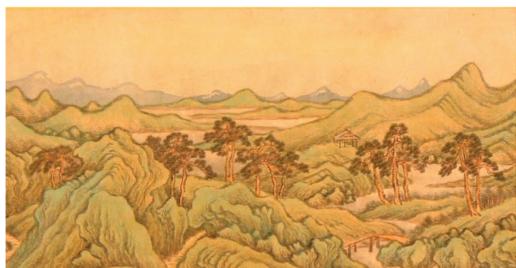
传统文化的彰显者,也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承载者。正是基于此,沈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卢林对辽博所藏这件《曹娥诔辞》推崇备至,毕竟晋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真正能确定的晋代书法作品留传至今的仅有3件,异常珍贵。

卢林说,这幅《曹娥诔辞》之所以重要,除了在中国书法史上,它是从隶书到楷书过渡的见证,也是“晋人尚韵”的实践。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件作品上有大量不同历史时期书法家、文学家等人的题跋,比如怀素、韩愈等名家。所以,它不仅具有书法艺术价值,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辽博供图)

两幅精美“青绿山水” 一段祖孙画家故事

本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

在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千峰翠色——院藏青绿山水绘画展”中,一对祖孙画作并非展出,让人们一睹曾被郑板桥称赞的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品。两位画家分别是康熙皇帝的第二十一子允禧和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瑤。因为永瑤曾被过继给允禧为孙,两位画家因祖孙名分而成为一段佳话。



《清允禧翠峰松泉图卷》(局部)



《清永瑤山水图册》(局部)

两幅精美山水画家大有渊源

日前,沈阳故宫博物院精选院藏书画珍品,推出了“千峰翠色——院藏青绿山水绘画展”。引人注目的是,在展览的尾声部分,策展人别出心裁地展出两件青绿山水作品——《清允禧翠峰松泉图卷》和《清永瑤山水图册》,其作者分别为清康熙皇帝第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和清乾隆皇帝第六子、质亲王永瑤,二人名义上为祖孙关系。

沈阳故宫博物院艺术部策展人王亦楠介绍,《清允禧翠峰松泉图卷》为手卷,纸本。在几株茂盛的松树掩映之下,村舍错落其间。远处群山起伏,间有瀑布飞流直下。湖岸边隐现几处屋舍,湖中轻舟上有悠然捕鱼。整幅画卷山石嶙峋,视野开阔,笔致超逸,设色大胆,画境深远,山野之中充满浓重的绿意,为清代精美的艺术真迹。

《清永瑤山水图册》为永瑤传世不多的作品中的一册,共八开,每幅画册表现内容各有侧重。第一幅勾画了山居归隐的场景:高大的山峰,茂盛的山林为画面主体,村居舍舍时隐时现,又有蜿蜒小径和溪涧回转其间。山下江边,有两条船影急急驶来,船上二人还似在引颈向家的方向张望。后人认为永瑤的工笔青绿山水画评价较高,认为其山水画作远习元明诸家,近受清代“四王”及宫廷绘画的影响,笔墨局意茂密,工整精到,画风中和恬适,造詣深邃。

《清永瑤山水图册》上仅题有“子臣永瑤敬画”六字和两枚白文方印,说明这一画册为当年永瑤献给他的父亲乾隆皇帝的画作。

与《清永瑤山水图册》有所不同,《清

允禧翠峰松泉图卷》的卷下方钤有“宝璽楼书画录”鉴藏印,反映了这一手卷在上个世纪所经历的辗转曲折。

祖孙画作辗转聚首沈阳故宫

宝璽楼是建于上个世纪初的一座藏宝楼,位于北京故宫西华门内,旧址名叫咸安宫。咸安宫曾是八旗子弟学习的地方,清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

1913年初,北洋政府决定将沈阳故宫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所藏文物运到北京。而北京当时又缺少妥善保管的地方,北洋政府就临时决定在咸安宫旧址上建造一处库房,这就是宝璽楼。

史料记载,从1913年11月18日至1914年3月24日,北洋政府分别从承德和沈阳先后分13批次将玉器、瓷器、书画等清代收藏运送至北京,藏于宝璽楼。其中从沈阳故宫先后分6批共运走11.46万件文物。

1914年成立的古物陈列所聘请有关专家,按照青铜、书画、陶瓷、金玉等科目对所有文物藏品进行登记造册,在书画类艺术品上,典藏人员分别加钤了“宝璽楼书画录”、“清允禧翠峰松泉图卷”上有“宝璽楼书画录”鉴藏印,说明这幅画曾藏身沈阳故宫,后被送到宝璽楼。

上世纪5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陆续从南京、承德、上海、陕西等地向沈阳调拨文物,特别是从1954年至1980年,北京故宫先后8次调拨文物给沈阳故宫。在这一过程中,《清允禧翠峰松泉图卷》《清永瑤山水图册》这两件由祖孙两辈人创作的顶流青绿山水画作得以在沈阳故宫安家,此次绘画展上又被策展人同时选出,一起对外展出。

因笔墨丹青而成就的祖孙缘分

《清实录》对允禧和永瑤记载的文字不多,特别是允禧,作为康熙皇帝的第二十一子,因为年纪幼小,远离了皇子间的权力争夺漩涡,自幼便淡泊名利,专心于笔墨丹青的文人雅事。他善书画,尤其擅长山水、花卉,“笔致超逸,画风清淡”,时人评为“本朝宗藩第一”。

允禧与乾隆皇帝弘历同岁,二人自幼便交好。弘历在所著的《乐善堂文抄》中记有:“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爱命皇四子宝亲王入侍内廷,以示宠异。是时王(指允禧)年方舞勺,而予齿亦均,相对甚欢。及皇上(指雍正)诏膺大宝,余以冲年特承恩命,忝封贝子,晋封贝勒。自顾寸寸足录,唯以恭谨、慎自检束,遂蒙恩眷。每人觐见上时,遇王辄承欢,把握深谈,大有乳水之合。”

这段话讲的是弘历小时候被康熙皇帝亲养宫中时,与年龄相仿的叔叔允禧非常要好。等到雍正即位后,允禧每次在雍正面前与弘历相见都大加赞赏,而且相談甚欢,叔侄情谊深厚。

及至乾隆即位,他便下旨:(允禧)“幼好读书,识见明晰,办理旗物亦属妥协,朕意欲封为郡王。”

允禧生平还有一位至交,那便是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二人之间有多首互相应和的诗作。郑板桥这样评价允禧:“胸中无一点富贵气,故笔下无一点尘埃气。读书好问,一问不得,不妨再三问,问人不得,不妨问数十人,要疑疑然,精理进露。故其落笔晶明洞彻,如观火观水也。”

允禧原有两个儿子,不幸早亡,晚年后继无人。在其去世后,乾隆将一个儿子过继给他为孙。

乾隆皇帝选的这个人便是他的第六个儿子永瑤。这一年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永瑤已经17岁。

对于乾隆将永瑤过继给已经去世的叔叔允禧这件事,研究人员有多种分析,解读最多的是乾隆不希望自己的儿子重蹈叔辈们皇权争夺的覆辙。不过,另有学者提出,对于17岁的永瑤来说,他所展露的书画、文学才华也应该在考虑之内。乾隆不会选择一个不学无术的儿子去承继以书画、诗文见长的叔叔香火。

当然,从《清实录》当中,人们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尽管永瑤过继给允禧为孙,但他一直使用皇太子称谓。

在永瑤的兄长先后去世之后,多才多艺的永瑤越来越受到乾隆的重视。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月,永瑤受命管理内务府事务,后晋封“质亲王”,兼总管内务府事务。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编纂《四库全书》时,永瑤担任总裁官,他还是乾隆七旬万寿庆典的组织者,是乾隆朝宗室子弟中很有作为的一位。

据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研究考证,乾隆晚年,承德避暑山庄的多处宫室装饰有永瑤的画作和折扇等。反映乾隆对这个儿子才学的欣赏,乾隆的诗作《题永瑤岁朝图恭进皇太后》中有:“学馥游艺亦功夫,写作平安如意图。恰合岁朝呈吉语,永绵亿载奉慈嫔。”对永瑤才艺赞赏有加。以至于当时前来朝贡的使臣在日记中写道:“第六子纯贵妃苏氏所生质郡王永瑤,序方居长,聪睿绝伦,旁通皇历,为皇帝属意,民望所系,亦在六王。”

不过,永瑤还没有等到父亲乾隆皇帝的八旬万寿庆典,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五月初一病逝,终年48岁。